

● 牛貴琥 著

# 《金瓶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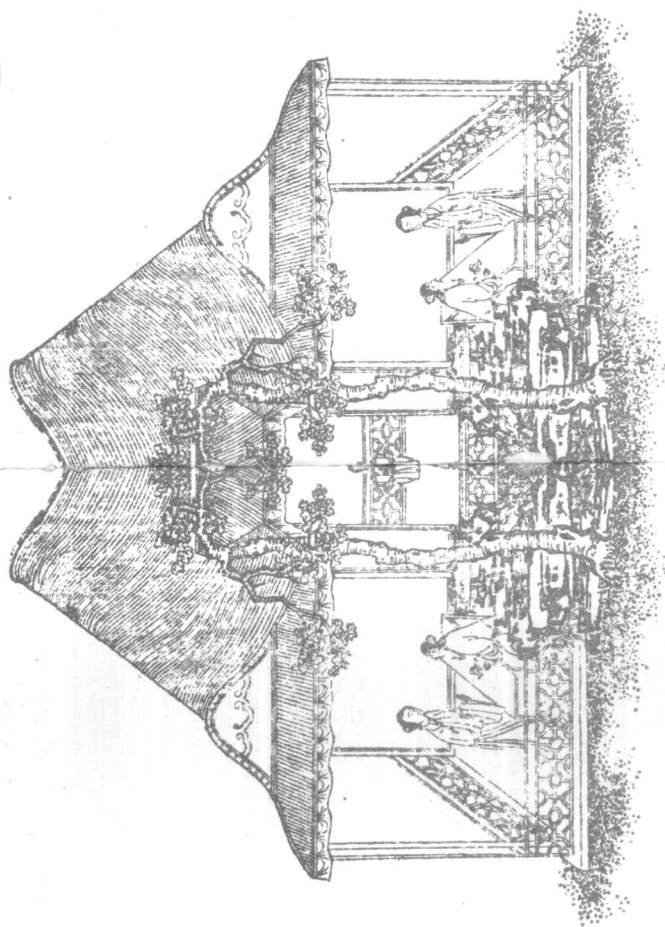
与  
封建文化

JIN PING MEI YU FENG JIAN WEN HUA

# 《金瓶梅》

● 牛贵琥 著

封建文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与封建文化/牛贵琥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4

ISBN 7-02-003382-2

I. 金… II. 牛…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047 号

责任编辑:张福海  
责任校对:张福海  
责任印制:周小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9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4.00 元

## 自序

长篇小说《金瓶梅》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她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她不写神与魔的争斗,不写英雄的历险,也不写武士的出身,像《西游》、《水浒》、《封神》诸作。她写的乃是在宋元话本里曾经略略的昙花一现过的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金瓶梅》“因一人写及一县”以至整个社会,是明代中叶以降社会的一个缩影,所反映的是封建王朝末期发展的总趋势,对于认识明代社会和封建文化的本质有着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然而对于这么一部伟大的不可多得的小说,其重要性虽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但在阅读和研究中也还存在着不能差强人意的地方。其中除了专注意于淫秽描写,把其当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之书,极端的庸俗化外,还突出表现在表层化和简单化的倾向。

比如,许多论者每每局限于、热衷于批判《金瓶梅》的淫靡奢侈,不愤于社会道德的沦丧。批判的笔墨不可谓不严厉,态度不可谓不激烈。但是不论如何严厉和激烈,都还超不出封建时代张竹坡、赵文龙等人所言“倚财肆恶”、“俨然一个大酒店、阔饭

---

<sup>①</sup> 本书中的“封建”一词,不同于欧洲中世纪之“封建”,乃基于长期流行的关于春秋以降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通用概念。

铺、体面窑子、众兴会馆……是个什么人家，成个什么人物”的窠臼。所依据的道德既然还是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为标准，所以结论也就和封建史书中史臣的论说没什么两样。而且这么一来，便将这一部反映现实的小说等同于笔记史料了。因为《金瓶梅》和其他史料的不同，正在于生动、细致地刻画了一个社会典型，于是我们即可从西门庆的发家过程及生活细节，来深刻了解社会构成和转变的来龙去脉，发掘其原因和实质所在。如果只是批判其现象，岂不是去看《博平县志》卷4所记：“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刃娇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风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纓帽细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等等这样的史料反而更准确、经济吗？

再如有些论者，每将《金瓶梅》中荒淫奢靡的现象，归之于统治阶级的影响。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有明一代的皇帝如武宗、嘉靖、万历，都是历代少有的荒淫之主。但是若要仔细考虑，事情则不会如此简单。因为整个社会风气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原因也不是单方面的。当时的淫靡之风是那么普遍，正如崇祯七年刻的《郟城县志》卷7所云，不仅“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而且“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轻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连《金瓶梅》中的韩道国、汤来保、杨光彦之流，有了点钱和地位也是同样的或加倍的荒淫奢靡。所以说，纯从阶级进行分析，或像封建时代的文人一样，将“敝化奢丽，百倍于

前”的原因归之为“盖一二狂狡，创为奇异”，使“富者欲过，贫者思及”，于是“不得不重财而轻义，不能不徇欲而忘亲”，（余华瑞《岩镇志草·贞集·迂谈》）都是想当然、简单化的做法。更何况封建时代的大臣文士都言“九重深邃，宫闱秘密”，所以说皇帝对民间的影响不可能是直接的、决定性的。

更有些论者，随着商品大潮的兴起，将《金瓶梅》中不合于封建礼教的内容当作资产阶级萌芽加以拔高和赞扬。他们强调西门庆作为明代中叶以后一个成功商人的新兴性质，把《金瓶梅》中的淫靡奢侈赋予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个性解放的新内容。这看似新奇实则多悖。因为《金瓶梅》淫靡现象的核心还是封建礼教的纲常，并没有在实质上冲破封建礼教。西门庆以官的身份经商，其他商人如李三、黄四在官府找个靠山经商，这种作为封建政权附庸的商人并不会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西门庆之流的大量挥霍浪费，和马克思笔下“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化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六便士一杯果汁酒和一便士一包烟”，“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资本论》第1卷第7篇）大相径庭。西门庆家庭式的经营，所雇用的伙计，也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自由劳动者。至于西门庆发了财以后，把金钱又大量投入到联络朝廷各级官员的关系之中，等于使其他官员从他的利润中分取一些份额的财富再分配，只能促进消费的扩大，而不会促进再生产的发展。这和资本主义也无丝毫共同之处。如此等等，都证明所谓《金瓶梅》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只能是简单的比附。

只批现象失之肤浅，简单比附失之轻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宽眼界从文化的角度，特别是封建文化

发展的角度,对《金瓶梅》的现象进行考查。因为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社会文化的产物,都和本民族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顺着这条思路进行考查,结果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正是封建文化导致了《金瓶梅》现象,而且通过对《金瓶梅》这部小说的研究,还能得到许多传统史书中所得不到的收获。

举例来讲,封建时代的文人那么起劲地批判《金瓶梅》的淫靡现象,好像是因为其违反封建礼教。但是经过对封建文化的认真考查,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现象不仅符合儒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原则,而且和封建文化的尊卑上下保持着一致。它之所以泛滥横流,正是极端专制和不公正的封建文化统治下的必然倾向。这就使人明白了《金瓶梅》现象之所以要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以及历代批判《金瓶梅》者为什么要自相矛盾和捉襟见肘的根本原因所在。比如文龙在批语中一边说西门庆一家是“一群狠毒人物,一片奸险心肠,一个淫乱人家,致使朗朗乾坤变作昏昏世界”,一边又说“人皆可以为西门庆”、“西门庆究竟大得便宜”、“闺门之中更有甚于画眉者,阅者直可与作者心心相印,正不必嗤其肆口妄谈”。(第27、1、23、49、51回批语)这都是由其批判手段之陈旧所决定的。若作进一步的考查,我们还可以从他们批判的口气、态度看出,他们之所以那么起劲地批判,关键只不过是因《金瓶梅》无情地、无掩饰地揭开了封建文化下的那张温柔的帷幕,将长期以来不便于、不能够、不愿意拿到桌面上的那一部分,集中起来公开暴露给读者,使其不敢正视、不好意思正视的恼火而已。有关西门庆发家、奢侈、经商的批判也是如此。

再如,不论对封建伦理道德采取批判或拥护态度的人,都是将其视为维系封建时代世道人心的力量。但是从《金瓶梅》中我

们惊讶地发现,世俗社会的人们对儒家的仁义礼智、修齐治平、贵义贱利等等普遍地懵懂无知,就连这些字眼也很少提到。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对社会、对政权是那样的漠然和不关心,甚至在民族的沦亡、朝代的更替之后,也是同样的麻木。普静禅师言“南北分为两朝,中原已有个皇帝”,要人们“安心度日”,就像韩道国讲起蔡太师败亡时无怨、无恨、无感情一样。(第100、98回)这倒不是说封建的儒家文化对世俗社会的人们毫不起作用,因为就是在这人们认为道德沦丧的时期,世俗民众的意识中儒家文化的尊卑上下之类也是根深蒂固,并没有沦丧。例如,《金瓶梅》中的人们,对于官吏的欺压腐化是那么漠然,而对于违反夫纲的女性则要极端仇视;对于贪财不义、蝇营狗苟现象是那么麻木,而对欺主犯上却是极端愤慨。这就说明,世俗社会的民众和儒家理论缺乏着内在联系,只能在外在的、低层次的基础上求得统一。事实上,对于世俗人士来讲,根本就不会对儒家先师产生忠实的崇高的信仰。他们之所以尊重儒家先师,只是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感,正像第70回何太监所云“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只识的一腿”一样。儒家思想在中央集权成熟期所发挥的效用竟然如此。这样的王朝和民众于外族入侵时即如摧枯拉朽,也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其实也不只是世俗社会,就是官僚士大夫阶层也好不到哪里去。例如有明一代忠奸之争如同水火,但都不会去反皇帝,都没有篡的野心。(宋以前即不然)最大的奸臣严嵩只是“惟一意媚上”。最刚直的海瑞把朱元璋的条例奉为金科玉律,听见昏君去世,终夜哭不绝声。就连反税监的葛成,被关十年出狱后,也是说“此馀生者,神宗皇帝之所与也。”(《明史》卷308、226,《崧阳草堂文集》卷9)《金瓶梅》中的平安被打、春梅被卖之后还不也是同样的吗?这哪里还有孟子“君之视

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的味道呢?对传统不断弃其精华的封建文化,孕育不出新的生命,只能产生肤浅、狭隘、浑浑噩噩的人众。这样的人众接受物质、本能的支配自然非常容易。可以说,《金瓶梅》现象若不产生,反而是值得奇怪的事情。

所以说,正是封建文化导致了《金瓶梅》中现象的发生,对《金瓶梅》的研究可以更深层次理解封建文化。笔者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研究《金瓶梅》,力求在封建文化中找出形成《金瓶梅》诸多现象的原因和质素,希望通过剖析这一典型,能对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有所裨益。由于本人学识、才力各方面的局限,论述当中一定有不少谬误,还望方家给予指正。至于本书中所引用的《金瓶梅》中的文字,除明确标明为《金瓶梅词话》外,其余均引自崇祯本《金瓶梅》。这是因为崇祯本名为《金瓶梅》,和本书的题目相合,而且其文字也比《词话》本规范和简洁,适宜阅读。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承张福海先生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使之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感激之余,在此一并致谢。

作 者

## 目 录

|                          |     |
|--------------------------|-----|
| 自序 .....                 | 1   |
| 第一章 《金瓶梅》,淫与浪的文化批判 ..... | 1   |
| 一 戒淫还是诲淫                 |     |
| 二 虚假与专横                  |     |
| 三 情趣与风韵                  |     |
| 四 豪气与自卑                  |     |
| 第二章 《金瓶梅》,利与欲的文化探讨 ..... | 83  |
| 一 有欲无情                   |     |
| 二 人欲横流                   |     |
| 三 利欲熏心                   |     |
| 四 官商结合                   |     |
| 第三章 《金瓶梅》,封建基因的文化审视 ...  | 170 |
| 一 昏昏噩噩                   |     |
| 二 无耻与无聊                  |     |
| 三 走向腐败的道路                |     |
| 四 末世的挽歌                  |     |
| 后记 .....                 | 257 |
| 主要参考书目 .....             | 259 |

## 第一章

# 《金瓶梅》，淫与浪的文化批判

在中国明代中叶，文学史上出现了一部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小说。这就是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它的出现使封建时代的文士们耳目一新，惊叹不已。当时的袁宏道先生于粗阅一过后就慨叹其“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但伴随着它的诞生也便开始了对它的含诟、曲解和焚禁。可以说《金瓶梅》是文学史上最具有争议、最被误解的一部小说。明代的太史董思白就在赞叹“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的同时，又对人讲“决当焚之”。沈德符也是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搜寻，见到后又惊又喜急忙“借抄挈归”，却于自己观看后当心如果有人刊行的话，“家传户到，坏人心术”。（见袁宏道《与董思白》、袁中道《游居柿录》、《野获编》）赞扬者虽是出自内心，但犹抱琵琶半遮面；攻击者虽然言之凿凿，却心口不一暗地里欣赏。其原因就在于《金瓶梅》所写“大抵市淫之极秘者”，（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特别是那近两万字的性描写，使封建时代的文士不敢正视、不敢接受。就是冠以“以淫止淫”、“引迷人悟”的原理，也不能改变人们忸怩、忐忑的心态。数百年来，围绕着《金瓶梅》的笔墨官司，其由来应在于此。

其实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金瓶梅》是“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中国小说史略》)而封建时代的文士之所以总要将目光集中在这一部分“下流言行”上,至少可以说反映了其心虚和不正常。因为赞扬者是艳羨或者是同样的腐败,而反对者只是以攻击来表现自己的清白。他们的心术本就不正,并不需《金瓶梅》来启发或诱导。其证据便是不论在《金瓶梅》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金瓶梅》的这种现象都层出不穷。就是性禁锢最为厉害的清代,缙绅先生的丑行也要比西门庆更变本加厉。例如沈起凤的《谐铎》中的“掌中秘戏”就写了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性方式。钱泳的《履园丛话》也载有好淫之缙绅,家中婢姬无不污狎。“稍有不遂,则褫其下衣,使露双股,仰天而卧,一棰数十,有号呼者,则再笞如数。或以烙铁烫其胸,或以绣针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颈。其有强悍者,则以青石一块凿穿,将铁链锁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扫地,一步一携,千态万状难以尽述”。这还不比西门庆可恶数十倍吗?从这个意义上讲,禁《金瓶梅》并不能便禁住了淫行,也不会便“正人心术”。

不过,《金瓶梅》中有性的描写是客观事实,也就存在着如何评价的问题,而且我们还要知道,《金瓶梅》中淫与浪的描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身就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华民族心灵的困惑、彷徨、惊惧、忧伤的反映。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华民族在性观念上的一曲哀歌。我们可以对它劈版禁毁,也可以煞费苦心地删之节之,然而不论好也罢、坏也罢,它都是一种客观的文化存在。而且这种文化现象在不断地延续衍化,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对后世以至当今都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是避而不谈、禁之删之所不可能奏效的。

深刻理解民族文化，建设新的精神文明，迫使我们对此进行探索和思考。透过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掩盖在表象下的深层次的意义和广阔的心灵世界。我们不愿在传统的淫与不淫上争论辩解，只是想在何者为淫、为什么写淫、淫的谬误，以及和淫相关联的“浪”的本质作一些剖析。其实，数百年来文士们大多是以耳食者为多。批淫、恶淫、恶浪者也未必认真思考和了解什么是淫、什么是浪。所以只有揭示其真实面貌，认清其本质，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

### 一 戒淫还是诲淫

诗云：

写生圣手定非淫，谁识兰陵感慨深。

举世还珠空宝筏，更于何处度金针。

古人说《金瓶梅》是淫书，于是后来读过和没读过《金瓶梅》的人也都说它是一部淫书。古人说潘金莲是淫妇，于是后来的人不论了解不了解《金瓶梅》中的这一人物，也都把她作为淫妇的代表。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家都这么说，所谓众口铄金，谁也不必或不愿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面也在于《金瓶梅》之中的确有近两万字的关于性的描写作为证据。然而，《金瓶梅》经过历代一而再的禁毁终于流传了下来，并且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学术界成了一门显学。为什么《金瓶梅》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呢？这并不是仅仅从人类的劣根性以及禁果效应便能得到解释的。于是人们面对这部书不能不感到困惑，不能不对所谓的“淫”作更为深刻的思考。

事实上好多人已经进行了这项工作。对《金瓶梅》的研究和批评代不乏人。但可惜其效果总是不那么理想。

例如有的论者采取了将《金瓶梅》整部书和其中有关性的描写分别来看的态度。他们认为《金瓶梅》实在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但是仅仅为了其中夹杂了好些秽褻的描写,就使这部本该受到盛大欢迎的名著反而受到种种的歧视和冷遇。论者为此感到痛心疾首,从而责备作者的不自重与放荡。他们主张:既然“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么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这些描写常是那么有力,足够使青年们荡魂动魄地受诱惑。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瞳之中容不了一根针似的。”那么,不如“除去了那些秽褻的描写”,使《金瓶梅》瑕去而瑜更显,“仍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所以主张删节本的出现。(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这种评论看似十分公允和客观,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出版删节本和研究探讨全书毕竟是两码事。事实上,《金瓶梅》作为一部描写世俗社会的小说,“淋漓尽致地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的表现出来”。它既然是以写“恶”为主的,所以也就写了这“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和其有关妇女的性活动。如果作者不这么写,也就没有了《金瓶梅》这部书。隐瞒了恶也就是对所批判对象的美化,其中的道理不难懂得。同样,有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中的淫秽描写是后来的书坊主人为了牟利而加进去的,原本是十分干净的。这也属精神可嘉但却不合实际的臆测。因为那些色情的描写本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非毫不相干的游离成分。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再如有的论者从指导读者如何阅读上来立论。他们认为《金瓶梅》的确是一本淫书,但是作者关于性场面性行为的描写

都是有所为的。只要不专注在这一点上，而是将全书细细平心静气地看过，就会有收获而不会有副作用了。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论调，从来为《金瓶梅》辩护的人都是这种主张。像明万历年间为《金瓶梅》写序的弄珠客就讲过：“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中还连威胁带劝戒地说：“观此书者，便知一回一戒，惴惴思惧，笃心而知自省，如是才可谓不悖此书之本意。倘若津津乐道，效法作恶，重者家灭人亡，轻者身残可恶，在所难免，可不慎乎！可不慎乎！至若不惧观秽秽淫靡之词者，诚属无稟赋之人，不足道也。”江含徵也说：“不会看《金瓶梅》而只学其淫，是爱东坡者但喜吃东坡肉耳。”这种论调自然不能说不合理，但实际上既难掌握又难以实行。因为如何去读是读者的事，谁能保证读者一定会遵照评论者的指导去做呢？何况在学术界，对于《金瓶梅》的评论就已经是人人言殊，读者又该按谁的观点去读呢？再说，香花就是香花，毒草就是毒草，我们总不能专让道德高尚和有免疫力的人去看，何况自称道德高尚的人往往并不见得高尚呢？总之，教导读者如何阅读效果并不会很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未必会比读者高明。往往读者和时间才是鉴别作品优劣的唯一尺度。

还有的论者在肯定可以进行性描写的同时，又对《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进行“怎样写更好”的探讨。他们认为：为了减少对读者的副作用，作品中的性描写要表现得高雅些。如何能高雅些呢？就是要掌握“心理距离”这一审美原则。距离太远则隔山观火，达不到物我两忘的观照目的；距离太近，则又容易让实用动机压倒或干扰审美体验；唯不即不离，“似与不似之间”，才是艺术的最佳表现距离。由于《金瓶梅》的性描写过分进入角色，

过分生动具体,细节语言过分逼真,所以也就容易使读者过分移情介入去分享人物的情景,距离完全消失,美感也就破坏了。因此,论者提议,作者如果像《西厢记》、《牡丹亭》那样,用比兴的手法、文雅的词采、和谐的音韵,造成优美的意象,拉远审美距离,像《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那样,较少器官动作,而重在写心理感受,并大量采用隐喻象征,富于飘渺朦胧的诗意语言,减弱感官刺激,那么就要成功得多,正像《红楼梦》从《金瓶梅》受到启发后“化腐臭为神奇”所采用的那种手法一样。(《文学遗产》1990年4期《〈金瓶梅〉性描写的批判》)论者的观点看似高明,但对《金瓶梅》来说毫无用处。因为《金瓶梅》作为一部以暴露恶为主骂尽诸色的小说,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出现优美、诗意的气氛;作为一部描写世俗社会的作品,就注定不会以文雅为特征,正如崇祯本的评语所云:“正以其俗而存之耳”。不然的话,书中的主人公就不会是暴发户西门庆,而成了才子佳人张君瑞、贾宝玉之类的人物了。所以说论者的本意是好的,无奈教导作者如何去写的做法往往是行不通的,因为作者对笔下人物的体验和观念任何人无法替代。何况《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在封建社会也一直遭批遭禁,《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并逃不脱淫书的恶名和被禁的命运呢?

还可以举出许多论点来。比如有的论者指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由于当时社会的腐败,在当时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并不足为奇。有的论者认为这些描写是受了王学左派思想影响的结果,所以包含着对程朱理学的反动,具有着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且不论其正确与否,充其量不过是找出了《金瓶梅》中性描写的基础和原因。还有人从统计学入手,认为《如意君传》中的性描写占了三分之二,而《金瓶梅》中只不过占了百分之二、三。言

下之意是《金瓶梅》不能算做淫书。但是决定是否淫书的标准，又岂是单纯数量统计能决定的呢？

用不着再举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有论者的思维模式都不脱古人的窠臼，都是集中在那近两万字的性描写上作文章，所以不论是攻击也好，辩解也好，都不容易有什么满意的结果，因为大家的基点实际上是一个。于是，否定论者固然麻利简单，但总使人觉得心有所不甘；为其辩解者固然有些必要，但总感到有些理不直气不壮，在是否有“溢美倾向”的批评下，以及是否能靠“这样的书来陶冶性灵、培养情操”的质问下，总有趑趄嗫嚅之感。而《金瓶梅》照样是青年不宜，照样不能冠冕堂皇去登大雅之堂。这不是几次学术会议上给与平反就可以完事了。

既然采用这同一标准使对《金瓶梅》是否是一部淫书的探讨陷入僵局，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改换一下思路，改换一下评论的标准呢？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眼睛死盯住这两万字的性描写不放，而是去考虑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文字，并进而去思考除了封建余孽的作祟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存在。可以这样说，只要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不论高雅的还是粗俗的性都应可以写，塑造西门庆这个特定人物所采用的特殊性描写也无可厚非。关键不在于“可以写不可以写”或“应该如何写”的辩论上，而应该放在“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和“作者怎样写”的思考上。这和《金瓶梅》是否适宜某些人看，完全可以分别在两个不同范畴去考虑。

要想知道《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首先要考察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在海淫。（所谓的海淫之作，指的是那些“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的书，以及那些“污人耳目，坏人子弟”的书。）明确了作者是不是在